

八十年代中国镇人口增长趋势和镇人口

迁入及其决定因素

——两种人口转移的历史性汇合

魏津生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和农村人口的地域转移既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又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两种人口转移,发展经济学和人口迁移学都曾进行过不少有价值的研究。雷文斯坦迁移法则(Ravenstein's Laws of Migration)、李氏迁移理论(Lee's Theory of Migration)、刘易斯-费-拉尼斯发展模型(The Lewis-Fei-Ranis Model of Development)和托达罗迁移模型(The Todaro Migration Model)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学说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都还需要补充、修正和深化。这不仅是发展理论的需要,而且是指导实践的需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处于农业人口产业转移与农村人口地域转移交汇点的镇的人口迅速增长和迁入,为研究这两种人口转移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素材。本文将主要在人口迁移学的框架内,利用统计和调查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数量分析,并就上述迁移学说中的有关论点予以探讨。

镇、镇人口、镇人口迁入

研究定义和数据来源

首先将本文所研究的镇、镇人口、镇人口迁入这三个基本概念及有关概念定义说明如下:

镇是指经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批

准建立的县辖镇,它是处于市(不含市辖县、下同)与县(不含县辖镇,下同)之间的一种居住地类型。近年来由于镇的总人口包含了过多的农业人口,不能反映镇的实际发展规模,因而本文所研究的镇人口仅指在镇居住的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则指居住在市和镇的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系指居住在县的人口,他们基本上均为农业户口。上述概念的如此界定,对于获取我国实际的统计和调查数据较为便利。所谓镇人口迁入,就全国而言,是指人口从市、县向镇的迁入;就每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为省区)而言,是指人口从本省区内的市、县以及外省区的市、镇、县向本省区镇的迁入。但从本文下面将要研究的我国80年代镇人口迁入的实际状况看,主要指所有的农村人口向镇的迁入。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镇人口增长中,有一部分是由于新建制镇的设立使人口重新分布而引起的。这种再分布的增长与人口自然增长相比,国际上更倾向于将其归入广义的迁移增长范畴。本文也照此处理。

本文在分析农村人口向镇迁入的决定因素时所使用的乡镇企业一词,按其完整的范围应包括:(1)乡办和村办企业;(2)社员联营合作企业;(3)其它形式合作企业;(4)个体企业。但文内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实际上只是乡办和村办企业的数据。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全部产值、收入、利润、税金、从业人员和工资

等绝大多数重要经济指标中，乡办和村办企业一般均占80%左右，完全可以称它们为乡镇企业的主体；其次，本文研究所必需的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在现有统计资料中也多限于乡办和村办企业；最后一点，是乡办和村办企业（特别是乡办企业）的依托地主要在镇，因而它们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到农村人口向镇的迁入，从而影响到镇的人口增长。

本文使用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我国历年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资料以及人口普查资料。有些来源不同或时期不同的资料，在统计时点或统计口径上并不完全一致，对此应予以一定的注意，但这对于文内所要研究的有关事物的特征、趋势和基本格局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镇人口的增长趋势及其来源分析： 城镇结构的改善和城乡间过渡层次的发育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是迟缓而波动的。只是在进入80年代，特别是1984年以后，它才走上迅速而稳定的发展道路。自1950~1983年我国城镇人口从6169万人增至14961.2万人，32年中平均每年仅增274.8万人，年增长速度只有2.8%。同期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从11.2%微升至14.6%，比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以1980年计为41.0%）低64.4%之多。但是，从1984~1987年的4年里，我国城镇人口从14961.2万人迅速增至19117.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39.0万人，相当于1984年前的3.8倍；年增长速度达6.3%，相当于1984年前的2.3倍。在这4年里，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4.6%提高到17.9%。由于目前我国市和镇人口中都有一部分家庭或个人虽为农业户口，但实际从事非农业活动，如把他们也计入城镇人口，则一般估计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应在25%以上；比现在世界城市化的平均值（以1985年计为41.6%）至少低40%，两者的差距显然较1984年前缩小了。

由于城市或城镇^①作为一个系统并非单一结构，而是由大中小城市和镇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因此人们有理由要问：1984年后中国城市的迅速进展是各类规模的市镇均衡增长还是非均衡增长的结果？计算有关数据表明，如以10万城镇人口规模为界，其上为大中城市，其下为小城镇，则自1953~1983年的30年间全国总计增加的6340.2万城镇人口中，有82.5%都被大中城市所吸纳，其人口年增长速度达2.5%；剩下的17.5%才为小城镇吸纳，其年增长速度仅为0.9%。这样，在我国的城镇结构上，大中城市的人口比重便从1953年已过高的55.9%又进一步升至1983年的67.2%；而同期小城镇人口比重则从已过低的44.1%又降至32.8%，较当时世界10万人口以下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以1980年计约为37%）低4.2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数值（以1980年计约为41%）降8.2个百分点。到1984年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1984~1987年4年中，全国总计增加的4614.9万城镇人口（包括镇内的自理口粮人口）中，只有48.1%被大中城市所吸纳，它们的人口年增长速度为5.1%；而有51.9%的城镇人口都被小城镇所吸纳，其年增长速度达10.4%。这样，我国城镇结构长期存在的头重脚轻的不合理状况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中城市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从1983年的67.2%下降至1987年的62.7%，小城镇人口的比重从32.8%上升到37.3%，比目前世界10万人口以下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以1985年计约为36%）还超出1.3个百分点，与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相应数值（以1985年计约为40%）的差距也缩小至2.7个百分点。因而

^① 这里讲的“城市”就是国际上通用的Urban一词，也可称为“城镇”。后面讲的大中小城市则为City一词，镇即为Town一词。

可以说,1984年以后,我国城市化的显著进展和城镇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小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

由于在1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中镇的人口占绝大部分(1987年全国镇人口占小城镇人口比重为90.4%,而10万人口以下小城市的人口仅占9.6%),因而我国近年小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实际上主要就是由于镇人口的增长。但是,镇人口增长又不外有两个来源:一是镇人口本身的自然增长,一是镇人口的迁移增长(其中包括因新建制镇人口重新分布而引起的镇人口增长)。那末,1984年后我国镇人口的增长又是以哪个来源为主呢?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自1984~1987年的4年间,我国镇人口从4 486.4万人增至6 601.7万人,共计增加2 115.3万人。如按1984~1987年全国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12.6‰估计,同期镇人口自然增长总数为288.5万人。由于镇人口生育水平在城乡间更接近于生育率较低的市而不是生育率较高的县,因而这一估计数应视其为上限值。这就是说,从1984~1987年间我国镇人口增长总量中来源于自然增长的不会超过13.6%,而来源于迁移增长的不会低于86.4%。即在这4年里,全国镇人口迁移增长至少为1 826.8万人,平均每年达456.7万人。再根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有关数据计算,1982~1987年5年内全国迁入镇的人口来自市的仅占14.3%,来自县的占85.7%。以此为参照,我们完全可以说,从1984~1987年我国镇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县人口,即农村的农业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向镇的迁入,并将自己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由此可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在进入80年代,特别是1984年后城市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城镇结构的改善和城乡间过渡层次的初步发育,其直接原因就在于,通过由农村向镇的人口迁移形式来实现的农业人口产业转移与农村人口地域转移的历史性汇合。这一点显然具

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正常的城市化进展不仅是城镇人口总量及其比重提高的过程,而且同时也是镇结构逐渐演变的过程。更具体地说,小城镇人口的比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发展以后的长时期中一直占有优势,然后当工业化基本完成,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时,这种优势才开始让位于大中城市,后者的人口比重才随之逐渐提高。这个事实早已为西方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所印证。从表1可以看出,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今天的发达国家虽然在当时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但其10万人口以下小城镇在全部城镇人口中的比重仍占近一半。其后的下降过程也很平稳,从1920~1985年的65年中共下降16个百分点。与此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从20年代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小城镇人口比重迅速下降,65年中共降低32个百分点,超过发达国家一倍,至今比重日趋接近发达国家。这显然并不是它们的

表1 1920~1985年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0万人口以下小城镇人口比重变动状况 (%)

年 代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920	52	47	72
1940	49	43	62
1950	44	42	46
1960	41	37	46
1970	39	34	43
1975	38	33	42
1980①	37	32	41
1985②	36	31	40

①② 1980和1985年为估计值。

资料来源:①Estimates and Projection of Urban, Rural and City Population, 1950~2025: the 1982 Assessment, UN, N. Y., 1985; ②Growth of the World's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1920~2000, UN, N. Y., 1969; ③Pattern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UN, N. Y., 1980.

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发展的结果。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刚刚开始起步,因而这只能是一种失衡的超前现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是历史上因殖民主义的侵略而形成的畸形经济和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产物,同时它也反映出战后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过分向大城市工业部门倾斜,忽视农村发展,特别是没有使联系城乡的小城镇这个重要的过渡层次得到发育的一种明显的失误。

早在上个世纪末,雷文斯坦就在他的迁移法则中,根据西方社会的经验提出了“分阶段迁移”的观点,即县内居民首先迁入邻近的镇,最后再被迅速发展的城市所吸纳。本世纪60年代李氏迁移理论又将其进一步概括为:迁移趋向为从各种农村地区迁入这些地区的镇,然后再迁入主要城市。但这些理论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在这些国家,战后小城镇的发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缺乏活力,处于严重萎缩的不发育状态。因此,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在离开土地后不可能更多地被小城镇所吸纳,而主要涌入大城市,特别是首位城市,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的城乡都带来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50~60年代形成的刘易斯-费-拉尼斯发展模型所提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工农业间的工资差异而向城市部门不断转移并使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工农业得到均衡发展的观点显然也不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它只是一般地考察“城市”和城乡人口迁移,而没有进一步从城市结构上展开分析,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城乡间小城镇发育不良所带来的严重制约。60年代末至70年代发展起来的托达罗迁移模型在结合发展中国家情况的研究上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在为解决这些国家的城乡人口迁移问题所提出的要注意农村发展,尽量减轻城乡经济机会不平

衡现象的主张,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托达罗对于在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小城镇,以此促进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对解决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仍然缺乏必要的认识,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这就明显地削弱了他的模型理论和政策上的意义。

以上所分析的是我国80年代镇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并指明这一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农村人口向镇的迁入以及它对推进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至于在这一时期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人口从农村迁入镇,其决定因素是什么,这种迁移又为何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经济后果,这将在下面进一步加以讨论。

镇人口迁入的决定因素分析(I):

乡镇企业发展的宏观效应

80年代我国农村人口向镇的不断迁入虽由多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所决定,但从宏观结构上看,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特别是乡办企业在其主要依托地——镇所启动的前所未有的对来自农村的人口迁入的吸引力和容纳力,显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乡镇企业(其前身即社队企业)虽然在50年代末就已建立,但由于当时它所依附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在80年代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直到1983年前后,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还不到1/4。作为乡镇企业主体的乡办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只有1567万人,因而使他们的主要依托地——镇所聚集的人口规模有限。如以目前我国每一乡村劳动者负担2.047人(包括本人在内)估计,它所聚集的人口约为3207万人。如从50年代末计算,平均每年只增加128万人,再除去其中来自本镇的人口,实际每年由农村迁入镇的人数还要少些。从8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1984年政府制订和推行的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入镇务工经商的政策,使广大农

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由于农民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市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需求,为了尽快富裕起来,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促进农村的现代化,他们以自己丰裕的劳动力和自有资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向非农产业转移,向乡镇企业的主要依托地——镇大量迁入。据统计,从1984~1987年的短短4年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从占农村社会总产值不到1/4迅速提高到一半以上。乡办企业从业人员从1567万人迅速扩大到2334万人,估计其所聚集的镇人口从约3207万人增至4880万人,平均每年约增加418万人,远远超过1984年以前的规模,因而这一时期每年由农村迁入镇的人数也比过去显著扩大。从总体上看,1984~1987年4年间,全国乡办企业从业人数年增长速度为11.1%,同期全国镇人口年增长速度为8.2%。这种良好的对应关系,也说明了这一期间我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宏观上对农村向镇的人口迁入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决定作用。

上述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口向镇迁入的宏观效应,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人口迁移学说。为了解决人口迁移问题,托达罗和其他不少发展经济学家都主张在农村普遍建立小型工业,将投资和经济活动引向农村。根据中国的经验,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是更应注意把投资和经济活动引向镇,这在全局上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由于镇是联系城乡的中间过渡层次,它在技术、信息、商品销售以及一些原材料、能源和零部件的提供上,比农村更易于与城市建立畅通的渠道;在劳动力的利用上,比农村更有吸引力;在生产和管理上,也比农村更易获得规模效益。1987年我国以镇为主要依托地的乡办企业虽然在企业单位数量上比主要以分散的农村为依托地的村办企业少64%,但它的从业人数还多于全

部村办企业的从业人数,其总收入更高出27%。同时,如果只强调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小工业,那么它所带来的过多的占用耕地、破坏生态环境、以及与城市大工业争夺能源和原材料的矛盾也就会更普遍、更严重,更难以解决。事实上,我国在今后对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整顿、改造和提高的过程中,这也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总的说,我国近年来乡镇企业特别是乡办企业以它的蓬勃发展,自力更生地解决了国家所不能提供的大量的镇建设资金;以它对农业日益增长的投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从而为镇所需要的人口迁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它还以较低成本的劳动力、较大的生产经营的灵活性、较强的产品竞争力,在面向城乡两个市场的优越条件中,为社会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商品,既改善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又使自身获取了显著的效益。所有这一切都必然极大地增强乡镇企业的主要依托地——镇对农村人口大量迁入的吸纳力,促进我国的城乡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进程沿着健康的道路持续发展下去。

镇人口迁入的决定因素分析(Ⅱ):

城乡收入差异的介入机制

上述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人口向镇迁入的宏观效应,从总体上为这种人口迁入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然而这种效应的实际发生还需要一定的介入机制,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机制的运作,才能诱导人们产生从农村向镇迁入的意愿,作出这种迁入的决策并完成迁入行为。这种介入机制虽然并不是单一的,但几乎所有迁移理论都一致认为,在城乡人口迁移中最核心的介入机制就是城乡间的收入差异。对此,刘易斯-费-拉尼斯发展模型考察了城乡收入的现实差异对人口迁移的作用。托达罗迁移模型则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严重失业也考虑在

内, 从而将上述现实差异改为预期差异加以考察。这里需要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 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 下文将以乡镇企业人均年工资表示镇的收入水平, 以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作为农村的

收入水平, 比较各省区这两者在 1983 年和 1987 年的不同差异及其变化, 分析它们与同期各省区不同的镇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从而反映出城(镇)乡收入差异对镇人口迁入的作用(见表 2)。

表2 中国各省区1983~1987年镇与农村的收入差异以及镇人口增长速度*

位序 省份	1983年			1987年			1983~1987年
	乡镇企业 人均年工 资(元) 1	农民家庭 人均年纯 收入(元) 2	镇与农村收入水 平之比(%) $3=1/2 \times 100\%$	乡镇企业 人均年工 资(元) 4	农民家庭 人均年纯 收入(元) 5	镇与农村收入水 平之比(%) $6=4/5 \times 100\%$	镇人口年 增长速度 (%) 7
全 国	543.5	309.8	175	909.5	462.6	197	8.2
(1)河 北	397.2	298.1	133	829.4	444.4	187	23.6
(2)山 西	536.1	275.8	194	962.1	376.9	255	25.7
(3)安 徽	498.5	304.6	163	709.6	429.3	165	12.4
(4)河 南	447.4	272.1	164	677.1	377.7	179	10.8
(5)山 东	392.4	367.8	107	834.4	517.7	161	17.2
(6)湖 北	487.0	299.3	163	760.3	460.7	165	12.2
(7)广 东	761.7	395.9	192	1345.4	644.7	209	22.3
(8)陕 西	542.8	236.1	230	660.2	329.5	200	11.9
(9)青 海	784.3	252.5	311	923.1	392.2	235	28.9
(10)宁 夏	651.2	288.7	226	407.9	382.7	107	9.7
(11)北 京	770.8	519.5	148	1293.0	916.4	141	1.7
(12)天 津	679.2	411.7	165	1039.0	749.4	139	5.8
(13)内 蒙 古	675.1	294.2	230	863.8	388.8	222	2.0
(14)上 海	663.0	563.0	118	1215.4	1059.2	115	4.0
(15)江 苏	525.1	357.5	147	915.3	626.5	146	7.4
(16)浙 江	532.1	358.9	148	981.1	725.1	135	4.6
(17)江 西	587.5	301.8	195	791.7	429.3	184	8.0
(18)湖 南	617.6	315.7	196	837.8	471.3	178	4.4
(19)四 川	524.8	258.4	203	673.9	369.5	182	7.7
(20)云 南	601.9	266.6	226	801.1	364.6	220	6.6
(21)贵 州	570.2	224.9	254	842.9	341.8	247	3.6
(22)甘 肃	655.7	213.1	308	750.5	296.1	253	1.6
(23)新 疆	691.8	307.3	225	932.6	452.7	206	2.7
(24)广 西	545.8	261.7	209	739.3	354.0	209	4.4
(25)辽 宁	625.0	452.5	138	1094.1	599.3	183	2.9
(26)吉 林	703.0	462.5	152	1066.7	523.1	204	0.8
(27)黑 龙 江	690.3	387.7	178	1095.0	474.5	231	4.4
(28)福 建	578.0	301.1	192	1023.0	484.9	211	6.0

* 西藏缺乏资料, 本表只包括全国大陆28个省区。

资料来源: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年。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8),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8年。

③ 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6年。

④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8),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8年。

⑤ 1983年和1987年中国人口统计年报。

首先,由于目前我国镇人口中待业率很低(城镇人口待业率只有2%左右),因而决定各省区1983~1987年农村人口向镇迁入的速度的镇与农村的收入差异,基本上不是预期差异,而是现实差异。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实收入差异的介入机制一般并不表现为收入差异幅度本身的大小,而主要表现为收入差异幅度变化的方向。从表2可见,1983~1987年4年间有10个省区([1]至[10])由镇人口增长速度间接表现的农村人口向镇的迁入速度高于全国的平均值,但这并非由于这些省区镇的收入水平比其它省区更多地超出农村水平所致。事实上1983年它们之中只有50%的省区镇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高于全国平均值,而1987年这样的省区所占比重更缩小到40%。看来,这些省区农村人口向镇迁入速度较快的原因,还是取决于这些省区在1983~1987年间镇与农村收入差异幅度变化的方向。从表2可以看出,在10个农村人口向镇的迁入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区中,有7个([1]至[7])省区,即70%的省区在这4年中镇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进一步扩大了,从而更多地刺激农村人口迁入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1983~1987年间我国其它18个省区([11]至[28])由镇人口增长速度间接表现的农村人口向镇迁入的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值,这也不是由于这些省区镇的收入水平比别的省区更少地超出农村水平所致。事实上1983年它们之中只有39%的省区镇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低于全国平均值,到1987年这样的省区所占比重虽有上升,但也只占50%。看来,造成这些省区镇人口迁入速度较慢的原因,仍然是它们在1983~1987年间镇与农村收入差异幅度变化的方向。从表2可见,在这18个省区中有14个([11]至[24])省区,即78%的省区,在这4年间镇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缩小了,从而对农村人口更多地向镇迁入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二,各省区镇与农村收入差异幅度在

一定时期的变化方向,是在一般条件下决定同期农村人口向镇的迁入速度的重要机制。但是,在特殊条件下,当个别省区的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和该省区的城镇结构同时显著偏离全国一般状态时,上述机制的运作便可能受阻,使农村人口向镇迁入的速度受到影响。从表2可见,通过镇人口增长速度间接表现的我国农村人口向镇迁入速度快的10个省区中,有3个([8]至[10])省区,即30%的省区在1983~1987年间,镇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并未扩大而是缩小,这显然不符合前述常规变化。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正是这些省区与其它省区相比农村收入水平较低(见表2)以及城市在城镇结构中数量过少(陕西只有8个市、宁夏4个、青海2个,它们是在大陆除直辖市及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中城市数量最少的三个省区)而给自身造成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条件。这就是农村收入水平较低使相当多的农村人口具有迁出意愿,但由于城市数量过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以迁入镇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尽管那里与农村的收入差异缩小了。另外18个省区通过其镇人口增长速度间接表现的农村人口向镇迁入的速度较慢,但它们中有4个([25]至[28])省区,即22%的省区1983~1987年间,镇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并未缩小而是扩大,这当然也与前述常规变化不符。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这些省区与其它省区相比,农村收入水平较高(见表2)以及镇在城镇结构中数量相对较少(这4个省区都只有二三百个镇,一般少于与它们大体相当的其它省区的镇数),从而给自身造成的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条件。这就是农村收入水平较高和镇的数量相对较少,使农村人口更愿意,同时也较易于向收入状况更好、数量分布也相对较多的城市迁入,而不可能大量地迁入数量相对较少的镇,尽管那里与农村的收入差异有所扩大。

第三,在研究80年代我国农村人口向镇

迁入的介入机制——镇与农村收入差异时，如将分析范围进一步展开就可发现，这一期间在镇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有所扩大的同时，城市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扩大得更多。如果以基本分布于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人均年工资表示城市的收入水平，从全国看，自1983~1987年的4年间，城市收入水平由865元提高到1546元，明显超出镇的收入水平；同期城市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也从279%扩大到334%，同样明显超过镇与农村收入水平之比的变化（见表2）。如从大陆28个省区看，情况同样如此（只有浙江的城市与农村收入之比在1983~1987年间稍有下降）。即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期间我国农村人口没有按照城乡收入差异机制的运作，更大量地迁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而是迁入镇呢？这里至少有两类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在80年代中国政府通过制订和推行有关政策，更加明确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这应该说是最主要的因素；二是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与大多数农村地区距离较远，相互间迁移手续较繁，涉及的问题较多，因而要实现这两类地区间的迁移，对迁移者来说必需要支付更多的经济上和非经济

上的成本。以上这两类因素都可称为城市与农村间迁移的介入障碍，所不同的是第一类障碍系人为设置，第二类障碍为客观存在。但应该指出的是，第一类因素，即政府的政策虽是一种人为的干预，可又是一种必要的干预。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与农村的收入以至其它方面的明显差异都不是短期内就能消除的。如在这方面不加任何干预，农民就必然会不断地、大量地涌入城市，既给城市的就业、住房、教育、基础设施等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可能会同时导致农村的衰败。这一点人们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

作者希望，本文所阐述的中国在80年代通过农村人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镇迁移的这种形式所实现的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与农村人口的地域转移的历史性汇合，以及它们对推进城市化、改善城镇结构、解决城乡人口迁移的社会经济问题所起的作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有关决策和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提供一个值得思考的实证。

（本文责任编辑：孙淑清）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

（上接第6页）

展区、大力发展城市区和特殊功能城市区。旨在不是仅仅畏惧城市膨胀加以消极控制，而是积极利用和发挥原有城市潜力，以便更快发展工业和更多吸收农村剩余劳力。

改变单向控制的人口迁移政策，首先开放同级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进而开放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双向人口迁移。待城市粮食平价供应制取消以后还可以逐步开放农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迁入某些有发展潜力的城

市。

在劳动人事制度上，扩大招聘，考试遴选，以及开放劳务市场，以便促进人才流动，改变单一统包统配的行政筛选制度。

此外，还要尽力避免由于大的经济失误而带来的骤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本文责任编辑：汪正鸣）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